
现代世界政治中的危机和互相依存

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为西卡斯塔的大部分确定了基调和标准。尽管每一个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各有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点，即技术是一切好事的关键，这种好处始终表现为物质的增长、舒适和快乐程度的增加……地球正在遭到破坏。矿藏正在被掠夺，燃料被浪费，目光短浅的农业使地力枯竭，动物遭到屠杀，植物遭到破坏，海水充满了废弃物和毒品，大气被严重污染……这些发疯了的人。有人提出了抗议，但声音太小了，不足以制止那个已经开始的、被贪欲支持的过程。

—多里斯·莱辛：《被殖民化了的星球》

没有全世界的配合，宇宙中的一个原子是无法运行的。没有全世界跟着走，是无法取得任何进展的。日益清楚的是，在种族的、民族的或任何其他狭隘的基础上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斯瓦米·维韦堪南达

全球性不安全

有人把狂热定义为“当你丧失原先的目标时，更加倍努力”。盲目追求本国安全完全适合对狂热下的这个定义。各国领导人在政治方面、在人力和财力方面对武器、对援助项目、对联盟、对开发资源投入的越多，个人、社会和我们整个星球的安全实际上反而下降。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技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不安全主要反映在对政治制度的效力感到焦虑不安，对任何制度都没有能力在不付出社会的和生态环境的高昂代价情况下提供“美好生活”感到失望。在占世界人口 3/4 的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发达国家中，不安全更带有各根本性：每天都要为生存而奋斗。（图表 1.1 描述了四个世界的情况。）

本书主要的课题就是要探讨这种无所不在的不安全感产生的根源和后果，以及它的不同表现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是互相联系的和相互助长的，例如，工业化国家对安全的追求主要是靠牺牲欠发达国家的利益，但在其国内也产生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影响。理由是很简单的：全球性的不安全在人力方面付出了惊人的代价；由于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狭隘地理解“本国的安全”，致使这方面的代价越来越高；这个全球性的危机渗透到世界政治的每个方面（如联盟、生态体系、全球金融和贸易、人员的流动和交流），从而形成了巨大的不祥之兆，同样也使人们迟迟不采取大胆的纠正行动；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星球存在的前景也不乐观了。

各国领导人总是把自己的情况说得最好。许多严肃的学者也坚持认为，人类将会解决今天的问题，正如他们解决了昨天的问题一样。不错，自从 1989 年 11 月 9 日拆掉柏林墙以来，事态的

发展的确使人有理由乐观。此后还不到一年，德国的重新统一就完成了。在欧洲共同体（现在叫欧洲联盟）12个国家中从1993年开始建立了单一的市场。欧洲地图的彻底改变是在苏联—美国关系发生革命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新思维”从根本上抛弃了“冷战”的老游戏规则。他1990年中期在华盛顿同布什总统举行的最高级会晤继续了美苏军备谈判，导致战后第一次实际裁减和销毁核武器。联合国恢复了维持和平的作用，在阿富汗、柬埔寨和纳米比亚等不同地区执行了维和使命。著名的人权激进分子获得了释放，其中包括在南非蹲了27年监狱的曼德拉。

同十年以前险恶的国际关系比较起来，这些事态发展似乎引入了一个和平安全的新纪元。十年以前，在世界政治斗争中占支配地位的是战争和战备，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紧张的核武器竞赛，以及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的社会动荡和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在这种短期比较的驱使下，一些评论家很快就从下列意义上宣布“紧张历史的结束”：苏维埃帝国的寿终正寝和西方在东欧似乎取得了胜利，从而为一个主要以技术发展为特点的稳定时代开辟了道路。

紧张历史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和种族的与宗教的民族主义在中欧和中亚的从新兴起很快又恢复了这样的紧张历史。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布什总统在海湾危机——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和吞并——（见第二章）以后，于1990年8月作了这样的宣布。本书的观点是，虽然“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基本上被经济竞赛所取代，并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但是，当从长远的全球性角度来评价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问题时，全球性危机仍然存在。宣布“冷战”的胜利和新秩序的建立可能使某些人在政治上感到满意。但这并不能代替实事求是的分析，因为他们无视了欠发达国家的生活质量和全球环境安全受到许多威胁的事

实。在本章以后的部分，读者可以看到，尽管在国际合作中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但是，全球性不安全正在加深，很难在技术上和外交上很快加以解决。

当年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在 1969 年最先提出了对安全采取全球性对策的紧迫性：

我不想过分渲染，夸大其词，但我根据我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得到的信息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联合国成员国可能还有十年的时间来把它们由来已久的争论放在次要地位而建立一种全球性伙伴关系，以制止军备竞赛，改善人类居住的环境，缓解人口爆炸，为发展努力提供所需要的势头。如果这种全球性伙伴关系不能在今后十年内建成，我很担心我提到的上述问题将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以至变得我们无法控制。

这位秘书长的警告不幸而言中。虽然我们的星球迄今为止还没有毁灭，但是，吴丹提到的那些问题的深度和广度的确已经发展到几乎无法控制的程度。到了 1992 年，我们开始为下一节收集资料，莫利斯·斯特朗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主持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即所谓地球高峰会议）的开幕式时，讲到了“文明的危机”。在政府领导人或大公司领导人中，很少有人赞同吴丹的或斯特朗的紧迫感。不过，大部分人承认全球性危机的某个方面，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些问题象征着一种可能有致命后果的传染病。生活和政治活动，还是一如既往，照常进行嘛。

令人奇怪的是，科学取得了惊人的跃进，以造福于人类；而与此同时，政治领导人则坚持陈旧的做法和过时的惯例，来谋求私利。政治行动既没有跟上科学进展的步伐，也没有跟上全球生态、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变化。吴丹之所以呼吁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是因为他认识到人类的未来受到了威胁。但是，他呼吁的那些政府过去没有，现在显然也不准备把全球的变化纳入狭

隘的本国视野的范围内。这正是我们时代的危机，这种危机同吴丹所描绘的任何危机一样，同样是沉重的：民族 - 国家制度内的政治意志危机。

本书的重点放在信息、解释和论述方面。本章首先列举一些关于全球性危机的基本事实，这对理解和阐述世界政治形态的变化——“冷战”时期的互相依存和“冷战”以后的全球化——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我介绍在有关世界政治的著作和思维中占支配地位的两个学派现实主义和公司全球主义，以及第三个学派全球人道主义。我在本书中使用了全球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和分析方法。在第二章中，我着重探讨了现实主义和公司全球主义。关于重新塑造世界秩序的三个案例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在现实世界中现实主义和公司全球主义如何既竞争，又合作。第三章从另一个视角详细研究了全球人道主义，并特别谈到全球人类的需要和环境的需要。本书特别重视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的受压迫者，因为他们构成了世界的大多数。这方面的讨论为下一步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从人类利益的角度更加具体地研究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第四章）、美国和俄罗斯（第五章）、欧洲和日本（第六章）的不安全问题。最后一章是讲政策的：它列出了一个以解决全球危机的主要问题为目的的变革日程。

关于我们星球现状的简要汇报

1992年，1600多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包括大多数健在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签署了一份宣言“对人类的警告”。这份宣言首先指出，“人类和自然界正在发生冲突……这可能使生物界发生巨大的变化，以至无法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方式继续维持生命。”次年，20位世界主要宗教的领袖们共同发表了一份“全球道德

宣言”谴责暴力行动“，特别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侵略和仇恨活动”。他们认为“，裁军是时代的要求。”使这些著名人物深感不安的全球危机已经变得十分严重，下面这些数字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 第三世界的二十多亿人口（包括居住在农村地区的 4/5 的人）得不到清洁水。世界 40% 的人口居住在严重缺水的地区。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粗略估计，其中大约一半人（十亿人）长期营养不良。

* 虽然世界识字率有了提高，但仍然有 34 个国家有 80% 以上的文盲。

* 1998 年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的人口大约有 12 亿人，绝大部分在第三世界；1995 年有 13 亿人，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的人口。他们每年的收入在 200 美元至 400 美元之间。他们生活在世界人口最多、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中。

* 据世界银行估计，到 2000 年，世界人口可能超过 60 亿，到 2025 年超过 80 亿，尽管全世界的出生率都在下降。80 年代，人们常作这样的比喻：世界人口每年增加一个墨西哥（8000 万人）而到了 1990 年，这个比喻改变为：每年增加一个孟加拉国（大约 1 亿人）。

* 按照目前的递减率到 2000 年，第三世界、特别是热带地区的森林将减少一半，从而加剧了燃料木材严重短缺的现象。大约 1/8 的植物品种（占迄今为止发现的 27 万个品种的 12.5%）有灭种的危险。用于粮食生产的表层土壤将减少 1/3。世界食物储备从 1960 年 100 多天的供应量减少到目前的 40 天。

* 在世界的收入中，发达国家目前占 4/5 以上，但在人口方面只占 1/4。美国大约只占世界人口的 6%，但消费的产品占世界的 30% 以上。相比之下，欠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的 3/4，而在世界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 1/5。

* 全世界的军事开支 20 年来翻了一番，1985 年达到 9400 亿美元，平均每天超过 20 亿美元。其中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开支超过 80%。自 1987 年以来，世界武器开支下降了，但 1994 年一年仍然高达 7000 亿美元。

* 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特别是那些实行军事统治的政府，它们的武器大约 3/4 是在市场上购买的。全世界购买武器的价值在 90 年代大大下降了。但发展中国家 1994 年购买武器的协议仍然超过 250 亿美元。它们购买武器的钱是用它们贫乏的资源 and 从发达国家的银行、政府借来的贷款支付的。截至 1987 年底，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钱接近于 11000 亿美元。

* 只要把世界军事开支中的很小一部分挪作民用，教育、保健和营养方面的情况就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一艘新的核潜艇大约需要 15 亿美元，这笔资金可以为 23 个发展中国家的 1.6 亿儿童提供教育费。估计大约需要 30 亿美元，就可以使最贫穷的国家在食品方面达到自给。同样，只要拿出一小部分资金，就可以每年使大约 1500 万儿童免于因营养不良、缺水和其他很容易医治的疾病而造成的死亡。

* 移居城市的人越来越多。据联合国预测，到 2000 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将达到 47%。在 1990 年至 2030 年，第三世界的城市将增加 160%，世界 21 个最大的城市中，第三世界将占到 17 个。因此，城市环境的质量正在迅速下降。据一项空气污染的综合研究报告说，世界所有 20 个最大的城市中都存在危及健康的问题，墨西哥市是最严重的。

* 世界上流离失所的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着。这主要是由于战争、贫穷和环境恶化造成的。每天大约有 2700 人变成“政治难民”在本国的难民或者经济移民。

* 据估计，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大幅度上升。1993 年估计有 1400 万人，1996 年为 2200 万人，1997 年为 3000 万人，其中

230 万人可能死亡。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每年新增 580 万。据世界银行估计，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中，如中国、印度和乌克兰，艾滋病病例可能爆炸性地增加。

* 一度被认为已经消灭的疟疾再度猖獗起来。现在，每年感染疟疾的人在 3 亿至 5 亿之间，每 15 秒钟就有一个人因得这种病而死去，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和孕妇。在过去十年中，因患疟疾而死亡的儿童比死于各种战争的儿童多十倍。据说，预防疟疾的最有效的手段是蚊网，买一个蚊网需要 5 美元，最贫穷的疟疾患者出不起这个钱。

* 从 1989 年起，武装冲突的数目减少了。但是，在 1996 年年初，仍然有四十多起种族 - 政治暴力冲突，世界的每一个地区至少有一起这样的冲突。大多数这样的冲突并不是种族问题直接引起的，而主要是反映了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以及政府赤裸裸的歧视。

对这些极其重要的统计数字和实事，可能很难一下子吃透其全部含义。但它们可以使我们对世界政治有一个全球观点：这着重表明了我们面临一个共同的危机，它具有多侧面、跨国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着要谈谈互相依存和全球化问题的原因。

互相依存

美国的公民们在华盛顿市和全国各地大学的校园内举行示威游行，为南非争取人权。柬埔寨的种族大屠杀、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问题，促使人们建议成立一个常设的联合国法庭来审判反人类的罪行。亚洲的金融危机使全世界的市场都受到影响，有可能造成整个地区的普遍失业和社会动荡。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

博帕尔的分厂发生灾难性煤气泄漏，使 3700 多人死亡、20000 人受伤；为此，印度政府暂时拘留了该公司董事长，并在美国的一个法庭对该公司提出了起诉。当英国广播公司大肆宣传埃塞俄比亚和苏丹有数百万人濒临死亡、嗷嗷待哺的情况时，全世界立即开始了紧急的食品救济工作。一个伊斯兰教恐怖组织宣布：“让他们知道吧：我们迟早要打入白宫、克里姆林宫、爱丽舍宫、唐宁街十号的中心。”日本的一份研究报告预言，由于日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所以如果东京商业区发生一次大的地震，那将对世界的金融界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反映了世界政治日益复杂的、跨国的性质。过去，国内事务和外国事务、外国事务和全球事务是截然不同的，而现在要划清这样的界限，则困难得多了。以前纯属各国政府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如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现在则成为国际外交的对象，有时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对象。大批普通人空前地受到世界事务的影响。全球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这个事实，而且获取信息的费用也下降了，因而有更多的人有机会对世界事务施加影响。

甚至发生冲突的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的老模式今天也具有了新的意义。不管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如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大国政府的权力游戏，如美国对中美洲的干涉，苏联对东德施加压力，不让它进一步加强同西德的经济联系，斯里兰卡、西班牙和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分裂斗争；还是领土争端，如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福克兰群岛而进行的战争——所有这些冲突的后果都远远超出了对冲突双方影响的范围。它们超越了国家的边界，不仅牵涉到其他国家的政府，而且牵涉到其他国家的经济、生活方式（消费品价格、文化、食品供应、公民自由、就业机会），甚至自然环境。

因此，全球日程变得更为广泛、更加多样化、更加凶险。我

们应当对它采用更多的分析手段。国际事务当然仍然是政治性的，但在研究国际事务方面，光靠政治学，是不够用的了。经济学同样是重要的，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对本国的和国际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是很重要的。此外，生物学（例如，研究酸雨）、人类学（现代化使当地的文化寿终正寝）、社会学（国际劳动分工）、女权研究（妇女在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组装线上）、宗教（不同宗教的普遍价值观）、甚至体育运动（从美国—中国的乒乓外交到慕尼黑和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恐怖活动和拉拉队）——所有这些都世界政治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跨国现象要求我们采取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真实地再现世界政治的本来面目。

这正是本书所采取的态度。我采取了多学科的研究手段和透视方法，以便从全球的角度最充分地探讨世界政治：跨越各国的边界，从各国社会的内部和外部，在社会活动的许多不同层面上进行研究（例如，占主导地位的伦理道德、种族、生态体系、经济阶级和行政机构）。由于全球政治经济的变化，美国暴露出种种弱点，但它毕竟仍然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家，因此，我着重研究它的政策和行为，多于任何其他国家。

本书采用的主要观点叫作“全球人道主义”。它把两种做法结合在一起。一种是一整套人道价值观和准则。这使我们可以从我们星球的需要和利益这个特殊的观点来研究各国的政策、意识形态、社会力量和机构组织，因为我们的星球被认为是人类的共同体，是一个生态体系。“全球人道主义”提供了政治的和伦理道德的标准，可以始终一贯地用来评价各种社会制度的政策和各个社会制度之间的政策。

另一种做法是政治经济。不论是用于国际政治，还是用于本书，政治经济都是集中于研究某种制度（如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和结构（如跨国公司和军工联合企业）对各国内部和国家

之间的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方式，因而决定了国家的和国际的安全性质。

把这两种做法结合起来，就使我们可以发现并说明当代世界政治的最显著特点：不平等。世界是如何损害贫穷国家利益的，谁从中获得好处，这种不平衡对人类的处境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是本书研究的中心。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过：“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中……一方面，民族—国家已经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另一方面，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球共同体。”今天的世界政治可以这样说：它正在两条轨道上同时前进，而这两条轨道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第一条轨道由传统的强权政治的治国人才组成，基辛格一直是这方面的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代表。推动沿着这条轨道前进的“发动机”叫作“现实主义”，即本国利益的哲学或模式，下面我们将谈到这一点。沿着另一条轨道前进的是“全球主义”，它从跨国力量的角度阐述世界政治。“全球主义”采取两种在政治上显著不同的形态，一种是“公司全球主义”（反映跨国组织的利益）另一种是“人道主义的全球主义”（反映全球共同体内的人类利益，最广义的人权），不管是哪一种形态，“全球主义”认为，在互相竞争的各国利益框架内的那种传统的政治至少是无法解决吴丹所提到的那些全球性问题的。“全球人道主义”认为，往坏处说，现实主义促成暴力。有造成生态自杀的危险。

不过，这两种观点的一致性日益增加。它们都认为，世界政治是高度互相依存的，并且不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最使人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的，莫过于1986年4月发生在前苏联（现在的乌克兰）基辅附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灾难性事故了。这是核电力史上最严重的事故，对此，苏联领导集团必须既对他们的公民负责，也对世界负责。各国领导人在评论切尔诺贝利事故时

候，当然都是着眼于自身的利益，要么是担心放射性坠尘，要么是想利用苏联的事故为自己捞取政治上的好处。但是，任何人，包括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都无法回避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全球性意义。苏共总书记（后来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说，这次事故表明有必要建立国际性的监测和报告核事故的制度。里根总统说，切尔诺贝利事故表明，有些问题具有超越本国利益的含义。这两位总统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似乎都接受这样的事实：当涉及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时，现实主义的政治是有严重缺陷的。

“互相依存”是世界政治跨国化的捷径，不仅事件是如此，而且思想、机构和决定也是如此。这种现象使各个社会以及社会内部的各个阶层的关系更加紧密了，由此产生了各种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下面我们还要谈到，现实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在互相依存对各国奉行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具体影响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在互相依存应当为谁的利益服务（国家的利益？公司的利益？具体阶层的利益？个人利益？）以及各种互相依存的因素如何互相联系这些问题上也各有各的看法。但是，现在达成普遍共识的是：互相依存已经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新的关键因素。

互相依存有许多含义，需要弄清楚。首先要从“相互依赖”这个意义上考虑这个词。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高度不平等的，有时是有依赖性的。然而，依赖性往往是相互的，而不是单方面的。例如，美国的经济不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样完全自主、无比强有力。那时，美元以黄金为后盾，成为唯一的国际货币。自 1914 年以来，美国在 1985 年第一次成为一个债权国：它对外国的金融债权（投资和证券持有量）超过了外国对美国的债权。此外，美国的工业对外国的石油、金属和矿物有极大的依赖性；工业部门 $\frac{1}{5}$ 的工作岗位依赖于对外国的出口； $\frac{1}{3}$ 的农田依靠出口。

其次，互相依存把世界经济看作是一个单一的一体化的单位。我们不再谈论资本主义制度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或者市场同非市场的对立）。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大国都深深卷入全球的资本主义贸易、投资、借贷体系。使波兰在 1982 年摆脱破产的，是西方银行，而不是苏联。西方银行的援助对俄罗斯在 90 年代的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资金的早期公司中包括日本的三菱公司、泛美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而不是国营的贸易公司。甚至像北朝鲜这样一个封闭的、整个外贸只有 20 多亿美元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没有国际上的食品援助和金融援助，也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界定互相依存的第三个方法是从全球性威胁的角度考虑问题，这种威胁是各个国家没有办法通过传统的外交来加以控制的。这样例子包括：恐怖活动、饥荒、生态灾难、核扩散、一些动植物的绝种。这表明有必要采取全球性的集体行动，其中可能包括建立全球性的机制来履行需要全球合作的任务。

第四，互相依存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问题无意识地影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国内”问题变成了跨国问题。切尔诺贝利灾难使苏联不得不进口粮食，减少苏联食品的出口，促使世界石油价格上涨，使核武器谈判停顿，造成华尔街股票在一日之内空前下跌。这个事故不断使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人死亡和受毒害。经济难民和政治难民源源不断地越过一些国家的边界进入别的国家去寻找工作或逃避战争的灾难。一个地区工业污染所造成的酸雨使另外一个国家的湖泊和森林遭到损失，中欧国家的酸雨对瑞典就造成了这样的影响。美国禁止使用的杀虫剂出口到了中美洲国家，结果又返回美国，因为它进口了那里种植的含有这种杀虫剂的咖啡豆。

界定互相依存的第五个方法是，一些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联系的现象实际上是互有影响的。人们通常援引温室效应来说明这

种互相依存的关系。由于空前大规模地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等这些矿物燃料而使地球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急剧增加，再加上森林遭到破坏，这可能是地球温度变暖的原因。许多科学家警告说，气候变化可能对食品生产、世界贸易、人类健康、人口流动、甚至对南北极冰盖产生严重影响。第二个互相依存的例子是，饥荒、人口过剩、森林被毁、土地沙漠化和政府的债务等所产生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欠发达国家、附属国的共同特点。

最后，互相依存表现在跨国流动和跨国机构的日益增多，及其政治上的重要性。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在国际政治中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但是，它现在得到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的补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后者所取代，或者被后者推到次要地位；例如，促进人权和民间援助的活动；争取社会变革的大众运动（如反核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这些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协调了行动）；跨国宗教、劳工、政治运动（如天主教的解放神学理论、工会以及欧洲和北美的绿色党派）；强有力的跨国公司、银行和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时还有个人，他们起一种跨国代理人的作用，实际上是世界公民，如杰克逊牧师，他在 1984 年总统竞选期间前往叙利亚商谈释放一个美国飞行员问题。

全 球 化

不管是哪一种互相依存，都有一个共同的后果：它限制了民族—国家在只考虑本国利益的情况下行事的能力。当这种影响深深地渗透到生活中，对一个国家的文化、语言（请讲英语！）、社会价值观、审美观、政治过程、公共政策、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和市场行为等产生持久的影响时，这便是全球化了。虽然这个词

（以及国际化）现在已经广泛使用，简直无异于口头禅，但它的本意是要描述一种严肃的事情：当超越国家水平的强大力量穿越国家边界时，便产生了一种一体化、一元化的效应。这些力量通常是经济力量，它们受跨国公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多边借贷机构的驱动，这些机构试图本着自身的利益调整和稳定世界金融和贸易。

从抽象的角度来说，全球化是中性的。它可以促进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社会正义和合作，如在教育、职业再培训、工会化、节能和技术共享等方面的公私联盟和国际联盟。通过国际化，或者通过对国际化作出反应，抗议运动、少数民族和非政府组织这样一些力量可以使自己更有能力来对抗或节制来自上面的经济、环保、多数主义等方面的威胁。国际化也可以主要是“全球性的购物中心”，给最富有的国家和公司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机会，来通过牺牲最贫穷的国家和社会阶层以及整个文化的利益，把世界变成一个大市场。如果走极端，其后果可能是非常可怕的。巴伯在《圣战同大世界的对立》这篇文章中谈到了这样的后果：前者是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是狂热的，反对现代世界的任何入侵，如阿富汗的塔利班派；后者是普救论者，他们是商业性的，坚持因循守旧的市场。

这个问题既是经济学问题，也是价值观问题。从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来看，全球化可能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正义力量，能够推动社会进入现代化；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推动“落后”的社会“先进”起来。这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是很时髦的。事实上，新的全球化生活方式好像是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一元化，只适合于富裕得在钱里打滚的人。莫里斯·斯特朗这样写道：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新的普遍化的文化，其代表就是 CNN（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广播公司）、可口可乐、麦当劳、利瓦伊牛仔裤等著名商标消费品、

流行音乐、购物中心、国际航空港、连锁饭店和会议中心。对于那些能够充分享受这种文化的少数特权人士来说，它提供了越来越广泛的、令人激动的新机遇和经历。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居住在非西方世界的、贫穷度日的人来说，他们往往被视为异己分子。他们是现代化的牺牲者，而不是受惠者。因此，毫不奇怪，卷在现代化激流中的许多人做出了焦急不安的反应，采取了拒绝的态度。他们退缩到传统的价值观和文化中去寻找自己的特性。

由于全球化果实的两极分化，它所提供的前途不容乐观，其民主化、多元化、平等、在环境方面可持续的程度并不比反对全球化的原教旨主义者所提供的前途好多少。

除非我们满足于说（本书是不满足于这样说的），当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时，总会既有受益者，也有不受益者；否则，我们就应当寻求另外一种意义的发展——人道的发展和另外一种意义的安全——人道的安全。这些问题，我们将在第三章和第七章加以讨论。它们之所以具有另外一种意义，是因为它们对不平等、冲突、不安全、自然秩序遭到破坏等的看法，并不认为是互相依存和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而是世界权力结构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造成的。如果人人享有平等、正义、生活神圣不可侵犯、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不采取暴力行动等常见的全球性价值观得到普遍贯彻，那么，互相依存和全球化就会完全不同于《圣战同大世界的对立》。而这正是结束“冷战”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真谛所在。

世界秩序？

布什认为海湾战争“提供了一个机会，为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建立一种世界新秩序，即规范各国行为的将是法治，而不是弱肉强食”。然而过后不久，事态的发展就给美国关于世界新秩序的谈论泼了冷水。世界各地的内战和人道主义危机表明，冷战以后的世界是何等混乱。不过，人们并没有住口，全世界继续谈论新世界秩序的意义。这个想法似乎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冷战的结束的确导致了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大重组。

这些重组是什么呢？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新的，有多大的重要意义？我们的第一步是弄清楚有可能重新界定国际秩序的 90 年代全球重大趋势。还要谈谈一些逆趋势，这里只作扼要的叙述，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作更加详细的阐述。

* 从结构上来说，世界政治日益多极化，但美国仍然是群龙之首，见图表 1. 1。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现在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分散。

图表 1. 1 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

	冷战时代 (1945 - 1990)	冷战以后的时代 (1990 -)
第一世界	美国, 苏联	美国——“超级大国” 欧盟, 日本——经济超级大国 俄罗斯——军事大国
第二世界	工业化的欧洲 日本,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第一层); 工业化的东欧 (如, 匈牙利, 波兰, 土耳其, 乌克兰), 以色列 (第二层)